

1964：中國經濟政治變動的歷史起因

• 李向前

一 現象：1964年中國經濟政治運行的突然轉軌

1962-65年，是中國國民經濟恢復調整時期。無論從理論設計還是人民心理的角度看，在這段時期爭取一種經濟政治的平穩發展態勢最為合理。因為，大躍進以來遭受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以及1959年後「反右傾」運動所帶來的政治「傷害」，需要得到積極的「醫治」和恢復。

早在1962年底，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就致信毛澤東，提出應把發展農業作為第一位的任務，以農業為基礎來完成工業化，以及着重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項主張^①。這一初步設想已經具備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雛形。1963年初，三五計劃以《關於編制長期計劃工作的要點》為題，由李富春正式提交中共中央討論。《要點》認為，三五計劃的奮鬥目標應集中力量解決人民的吃穿用，而不應把其他的經濟取向，例如國防和發展尖端軍事技術作為主要的努力方向。它們最多是處於兼顧的地位，並且在總體上是收縮的。當然，當時更沒有提出戰備問題。中共中央討論後同意了《要點》的設想。1963年9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確定以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兼顧國防、突破尖端技術的次序安排經濟計劃^②。這可以看作是正式批准三五計劃。

計劃官員以上述方針提出三五計劃，是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他們認為，大躍進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計劃變動太快，甚至處於隨心所欲的無計劃狀態，因而「吃了苦頭」^③；其二，大躍進嚴重破壞了農業，甚至發生糧荒，幾年中人民口糧竟難以為繼，因此必須以吃穿用為主導方針安排計劃。鄧小平於9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建設五億畝穩產高產農田（約佔總耕地數的三分之一）的主張^④，是「吃穿用」方針的極好註腳。

應該說，這是一個實際的、比較符合社會需求的計劃和設想。但是，實際歷史進程卻並未按照大多數人的願望發展。進入1964年，中國國內經濟政治即開始發生變動。變動的原因，是毛澤東對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看法有了重大改變。他不再認為上述恢復性計劃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意義，而強調戰爭危險的迫近，強調「敵人到處可來」的可能，提出必須做戰爭準備。從而，改變了社會預期的恢復性目標，將「吃穿用」取向變更為以戰備為主的社會性動員。這次變動極大地調動了物質資源，甚至使國家的基本工業布局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並進而波及政治格局，造成了從基層到中央的全面緊張。在共和國50年的政治

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目標集中於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出於兩個原因：其一，大躍進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計劃變動太快，因而「吃了苦頭」；其二，大躍進嚴重破壞了農業，甚至發生糧荒，因此新計劃必須以吃穿用為主導。這是一個現實的、符合社會需求的計劃。但是，進入1964年，中國國內經濟政治即開始發生變動。

經濟歷史上，這是一次影響十分重大的變動。那麼，毛澤東提出這一變動的事實依據是甚麼？這種考慮是否合理和合乎現實？

如何評估這一變動？有一種觀點強調中國的外部形勢，即認為與不斷升級的越南戰爭以及中國周邊局勢緊張有關，認為在1964年時^⑥：

中國周邊環境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局勢，外來軍事侵略彷彿隨時可能發生。1964年8月5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兩個多月，美國海空軍向越南民主共和國發動襲擊，把侵略的戰火從越南南方燃燒到北方，直接威脅中國的安全。在北面，1964年以來的中蘇邊境衝突在不斷惡化。在西南面，中印邊境的緊張局勢也沒有完全消除。

由於毛澤東對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看法有了重大改變，轉而強調戰爭危險的迫近，從而將「吃穿用」取向變更為以戰備為主的社會性動員。這種變動使國家基本工業布局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並進而波及政治格局。那麼，毛澤東所賴以提出這一變動的事實依據是甚麼？這種考慮是否合理並符合現實？

因此，中國的基本戰略方向便不能不向戰備傾斜。

從簡單的因果關係看，這個闡釋似乎很合理。因為在60年代中期，中國相當嚴重地孤立於世界之外。中國奉行的反帝反修的「革命」外交路線，致使同美、蘇兩個大國的矛盾日益深化，幾乎喪失了調和餘地。中國所面對的眾多外部「敵手」，無論在潛在的還是現實的意義上，都可能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於是，選擇戰爭準備作為國家經濟政治的着重點，就變得十分必要了。

但是，當研究者分析一個重大的國內政治經濟變動的原因時，還需要估量更為複雜的形勢。這就是說，除考慮外部威脅外，亦應該看到中國內部的矛盾因素，以及由外部威脅與內部矛盾交相作用所產生的緊張狀態。60年代的中國處於一個政治局勢相當複雜的時期，國內外的「變數」都很大，而且十分活躍。至少有一點研究者需要特別注意，即同50年代相比較，在後續的十年中，國內意識形態因素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顯著，它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也明顯加強。如果說，對外部威脅的憂慮是一種現實的考慮，那麼，意識形態因素就類似於「發酵劑」，會加重實際上的「危險感受」。

本文觀察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變動時所要考察的，是如下幾種「變數」的結果：一、如果外部威脅帶來的風險，大於國家突然實行經濟政治轉軌所要承擔的風險，那麼國家的重點轉向戰備和改變工業布局就是合理的；二、如果高估了外部威脅所帶來的風險而迫使國家經濟政治進行轉軌，那麼這個「轉軌」的風險代價勢必過高；三、如果「轉軌」並不主要是來自對外部威脅的考慮，而是有另外的因素，例如意識形態的影響，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及內外因素相互作用等等，那麼，就更有必要對其合理性提出懷疑。對目前較為流行的結論，即越戰是影響60年代中期中國自身變化的最重要原因；中國對越戰問題作出了「高強度」反應，因此在此後的冷戰中佔有了特別重要的地位等等，筆者明確提出質疑，而且肯定中國1964年的經濟政治轉軌具有某種不合理性，其真正原因也並不僅僅在於外部的確存在着日益增大的威脅，因它並不像人們想像得那樣嚴重。這就是說，「轉軌」一定有更為複雜的背景性因素，要對其作出合理的歷史闡釋。

二 問題：毛澤東推動經濟政治轉軌的內在原因

有證據表明，以往對1964年中國國內戰略方針變動依據的研究，是比較含糊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研究者的意識中所謂「流行觀點」已先入為主。但

是，歷史研究講求精確。例如，北部灣事件發生於1964年的8月初，而毛澤東提出改變三五計劃指導方針卻至少是在此前兩個多月，這一時間上的錯位問題，長期以來似乎並未引起人們的充分注意。又如，毛澤東關於改變戰略指導方針的意見，是在原有工作日程正按議定節奏正常運行之時，毛個人向中共中央「一線」領導人提出的，這就帶有某種突然的性質。於是，研究者應該追問：毛澤東為甚麼要以一種突然的方式，打破正常工作計劃，而用別人完全沒有料到的新東西來代替原有設計呢？再如，在這種突然改變原有計劃的過程中，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如中蘇兩黨意識形態爭論的擴大化以及國內階級鬥爭被特意突出，也在發生着作用？當然，更為必要的是應該解釋：如果認定越戰是促使中國政治經濟變動的首要外部因素，那麼，在估計戰爭強度和波及範圍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國家安全的憂慮是否足以迫使他們必須修正已經認同的休養生息的計劃？

問題要從毛澤東斷然改變三五計劃指導方針的原因說起。

毛澤東原本是擁護「吃穿用」計劃的。1963年8月他首先提出，1963、64、65年仍應作為調整的年代^⑥。毛澤東的這個意見，是在當時要不要繼續調整的兩派意見爭執不下的情況下，向中共中央核心提出的。這表明他最初並不主張重新擺開大投資的經濟戰場來建設後來所說的「三線」，更沒有將戰爭準備納入視野。這是大躍進遭到嚴重失敗後人們普遍願望的正常反映。

可是，毛澤東在不到十個月之後，即在1964年5月中共中央即將開會討論已經醞釀成熟的三五計劃之前，卻提出了他的「三線計劃」。他在5月10日和11日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時，有若干重要插話，其中兩點改變了匯報者原有的思路：第一，當談到鐵路交通在第三個五年內只能搞那麼多時，毛澤東說：「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第二，當談到基礎工業、交通同各方面還不適應時，毛澤東說：「沒有坐穩，沒有站穩，是要跌交子的。兩個拳頭農業，國防工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要擺好。要把基礎工業適當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適應。」^⑦顯然，把基礎工業搞上去而其他不能太多的提法，同「吃穿用」取向相矛盾。因為李富春在1963年底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上，剛剛代表國務院聲明：「各級計劃必須克服屁股坐在工業上的毛病，要首先抓農業發展計劃和支援農業的計劃。」^⑧而國防工業成了另一個並列的「拳頭」，也非計劃官員們原有設想。

這裏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有沒有證據說明，毛澤東突然改變已經基本成形的三五計劃「盤子」，提出戰備與三線建設的意見（這是不能違背的意見），同越戰之間有明顯的因果關係。研究證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最主要的反證即如上述，毛有關必須實行戰備和加緊三線建設的觀點，提出的時間都早於8月5日的北部灣事件，早於美國開始轟炸越南北方、越戰明顯升級為全面戰爭這個標誌點。這是值得深思的。

事實上，從5月10日開始，毛澤東關於戰爭和預防戰爭的說法越來越明確和嚴重，到6月16日十三陵談話時達到高峰。5月10-11日，毛澤東的說法是，不建攀枝花，「打起仗來怎麼辦？」「打仗，我還是寄希望於步兵。原子彈要有，搞起來也不會多，但要搞起來，搞起來嚇人。黃色炸藥和大炮很頂事，帝國主義對這個很害怕。」^⑨5月27日同中央常委談四川三線建設問題時，毛說，現在要準備，要着手。現在不着手，耽擱了時間，將來不利。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甚至於三、四、五幾個五年計劃之內，打仗還是靠常規武器，但是為了使帝國主義在發動戰爭之

毛澤東原本是擁護「吃穿用」計劃的。1963年8月他首先提出，1963、64、65年仍應作為調整的年代，並沒有將戰爭準備納入視野。可是，在不到十個月之後，毛澤東於1964年5月卻提出「三線計劃」。顯然，把基礎工業搞上去而其他不能太多的提法，同「吃穿用」取向相矛盾，也非計劃官員們原有設想。

前考慮一下，也要有尖端的東西^⑩。6月6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⑪：

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甚麼時候打仗。決定戰爭最後勝利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常規武器。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衝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着覺。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毛驢子去那裏開會，拿我的稿費去搞。

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談到戰略防禦方針時，則否定了原有的「北頂南放」的防禦戰略，指出，敵人到處可來，應處處備戰，提高警惕，根據敵人來勢，以決定主攻、主防方向。並提出，大區書記要抓軍隊，不能只要錢不要槍^⑫。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就戰爭準備還是就三線建設而言，此時毛澤東並沒有專門考慮越戰及越戰所帶來的安全問題。反之，他設想的是，敵人到處可來，應處處備戰。

敵人到處可入侵，要處處備戰的概念，似乎是估計中國已處在迫近的危險中，但實際上對來敵的估計十分模糊，甚至還沒有原本確定的「北頂南放」^⑬原則在戰略上具有針對性了。周恩來對「三線」的定義性解釋是^⑭：

除了攀枝花(位於西南川滇交界處)以外，我國周圍各省都是第一線。東南沿海，舟山是最前邊，東南幾省是第一線。對東南亞來說，南邊是第一線。對印度來說，西藏是第一線。對修正主義，西北、東北各省互相來說又都是第一線。比如，西藏有事，內地都是三線。真正的三線是青海、陝南、甘南、攀枝花。

這裏對東南西北四個方面都考慮到了。姑且不論現實危險是否真有那樣大，僅就最低限度而言，對南部即越南方向的防範，同其他三個方向是平列的。這就是說，對所謂南方已經「燒到家門口的戰火」(尚未發生北部灣事件)，當時中國領導人並沒有感到中國應進入臨戰狀態。由此可以判斷，改變三五計劃的基本指導思想，提出三線備戰問題，並不是因為有特別急迫的戰爭壓力，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出於某種不確定的危險意識。

與其說從南方來的戰爭壓力大一些，不如說當時人們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北方。在李富春5月28日所作「關於計劃安排的幾點意見」中，三五計劃原本要新建的最大項目是酒泉鏡鐵山鋼鐵廠。該項目預計到1972-73年完成一期投資，規模為100-150萬噸的產量(預計投資11-12個億，已投資兩個多億)。但5月27日毛澤東同中央常委談話後，酒泉鏡鐵山的戰略地位發生了變化。李富春說：「所謂後方，一個是西南，一個是西北，現在最靠得住的還是西南。」鄧小平當場作的解釋是：「酒泉過去和西南一樣是大後方，現在變了，也算第二線。」^⑮很明顯，酒泉大後方地位的改變，是周恩來關於「對修正主義，西北、東北各省是第一線」的說法出於同一考慮。只是，鄧在這裏說酒泉所處的西北算是「二線」。至於周恩來所說的「修正主義」，當然是指蘇聯。

自1960年8月蘇聯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挑起第一次邊境衝突之後，中蘇邊境開始變得不安定起來。1962年又發生波動面更大的伊犁、塔城事件。從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蘇邊境地區共發生千餘次衝突^⑯。這些衝突不僅有損於兩國正常關係，而且也引起雙方對歷史上中俄簽訂之不平等條約的保留性質

在1964年6月6日中央工作會議上，毛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危險。」「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着覺。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毛驢子去那裏開會，拿我的稿費去搞。」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談到大區書記要抓軍隊，不能只要錢不要槍。由此可見，無論是就戰爭準備還是就三線建設而言，此時毛澤東並沒有專門考慮越戰及其帶來的安全問題。

辯。1963年3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公開提出《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是沙皇俄國政府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質疑如果蘇方援引香港、澳門的例子，是否意味着「要把所有不平等條約問題通通翻出來，進行一次總清算呢」？1963年9月27日，中國外交部照會蘇聯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條約問題。11月19日，中國的照會又進一步明確提出「整個中蘇邊界有很多問題需要討論」^⑩。

顯然，對蘇聯這樣一個具有深厚大俄羅斯思想傳統，又極端注重邊界與安全關係的國家，中國提出歷史上的邊界問題，要比一般的劃界談判嚴重得多，因為它可能意味着重大的邊界調整。特別是，當中蘇意識形態爭論已經達到白熱化的時候，這種邊界爭論極為敏感。因此，毛澤東1964年7月10日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三時再一次強調：「大約100年前，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才成為俄國領土，於是，海參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蘇聯的領土了。這筆帳我們還沒有算。」^⑪赫魯曉夫對此反應很強烈^⑫。當然，毛澤東無意翻歷史舊帳，中國也不會謀求蘇聯的領土。按毛澤東自己的話說，這只是「採取攻勢，說些空話」，讓赫魯曉夫「緊張一下」^⑬。

在毛澤東看來，「緊張」與「不緊張」之間，有着辯證的、轉換的關係。有時，為了一個階段的不緊張，往往有意去製造一定程度的緊張。在緊張達到某一限度時，釋放或減緩緊張度，從而爭取到所謀求的不緊張；有時，為了另外的目的，可以製造緊張，然後轉換矛盾或問題的焦點。毛澤東常講不怕鬼的故事，意思即在於說明：越怕鬼，鬼越來；越不怕鬼，鬼反而嚇跑了。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對於毛澤東這種浸透了中國文化精義的戰略思想，在很長時間裏摸不到真諦。他們有時會把表面上「緊張」所隱含的意圖看得過重，真的被調動起來，形成面對面的緊張；而有時卻又太過自信，從而忽略掉某種非常重要的信號，在複雜形勢面前不能發現「登堂入室」的門徑。直至很久以後，人們才認識到，毛澤東非常善於以虛實結合的謀略來調動「敵人」，維護中國的安全利益。其情其景就像中國兩個著名的文化特徵：長城與空城計^⑭。

毛澤東常講不怕鬼的故事，意思即在於說明：越怕鬼，鬼越來；越不怕鬼，鬼反而嚇跑了。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有時會把表面「緊張」所隱含的意圖看得過重；而有時卻因太自信，忽略掉某種非常重要的信號。直至很久以後，人們才認識到，毛澤東非常善於以虛實結合的謀略來調動「敵人」，維護中國的安全利益。

三 緊張？毛澤東實施新戰略的真實意圖

儘管中蘇意識形態爭論在1964年激化到了最高點，但沒有證據表明，當時蘇聯確有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的意圖。邊界問題的確構成了雙方爭執的熱點，不過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識形態爭論的陪襯。蘇共中央1964年3月7日給中共中央的覆信，竟對他們前一年11月來信中列在第一位、要求中共中央回答的邊界問題，隻字未提。當時中共中央對蘇聯內部狀況的估計是：赫魯曉夫搞工業黨、農業黨、大開荒，效果甚差；內部思想混亂，不滿情緒增長。毛澤東甚至預測到，赫魯曉夫在近期可能要被搞下台^⑮。因此，毛澤東認為，在中蘇關係上，「現在我們轉入了反攻，有大鬧天宮的勢頭，打破了他們的清規戒律」^⑯。此外，中共中央核心成員對赫魯曉夫也執這樣的看法：此人欺軟怕硬。我們硬一點，他不見得會怎麼樣。但是我們軟下來，反而會吃虧。在1964年的若干次外賓會見中，儘管毛澤東向客人詢問過蘇聯是否會打仗的問題，但內部的底線估計仍然是：「激他拋出一切法寶來」，比方說採取「集體措施」，斷交，撕毀中蘇同盟條約，以至出兵。但現在要大規模出兵打中國還不可能，而搞點摩擦、製

造一些邊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②。如果這個判斷成立，那麼做有限的軍事準備是必要的，而從打核戰爭出發來進行戰略性預防，以至對整個國民經濟做適應戰爭的重大調整，則理由不甚充分，為時也過早了。

在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決策核心的主觀認識上，對南部來敵，即美國有可能在越南造成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也還沒有達到即將發生戰爭的緊迫程度。1964年7月1日，劉少奇在天津部隊軍級幹部座談會上指出^③：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談了軍事問題，講了敵人進攻的幾種可能性。我們從最壞的可能性作準備，準備好，爭取最好的可能。現在還沒有看到帝國主義要想打的象徵，但是，要做準備，要經常有敵情觀念。

中蘇意識形態爭論在1964年激化到最高點，但尚沒有證據顯示蘇聯有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的意圖。在中蘇關係上，毛認為「現在我們轉入了反攻，有大鬧天宮的勢頭，打破了他們的清規戒律」。對是否會與蘇聯打仗，內部估計是：「激他拋出一切法寶來」，比方說採取斷交，撕毀中蘇同盟條約，以至出兵，但現在要大規模出兵打中國還不可能。

這裏所說的「帝國主義」，明顯指美國。這一講話否定了越南戰爭正在向中國迫近的可能性。劉少奇在這裏使用了「有準備」和「敵情觀念」兩個語句，屬提示性用語，並不表明事態已經具有了重大的緊迫性質。在1962年台海危機中，這類用語更為常見。因此可以肯定，指出帝國主義目前「還不想打」，是劉少奇對毛澤東十三陵談話的準確理解。向軍隊高級幹部交代這種理解，對後者把握國際鬥爭的基本動態有重要意義。

毛澤東本人的判斷更具戲劇性。1964年8月13日，即北部灣事件發生後十天，毛澤東在同越南領導人黎笋分析美國是否決心越過17度線侵佔越南北方時說：看來美國、越南和中國幾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來。他因而贊同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採取巧妙辦法以不去惹怒美國人的決定^④。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認為：如果說，美國把蘇聯當作近期的主要敵人，而把中國看作是長遠意義上的敵手，那麼，因為帝國主義是實用主義者，「『長期』，對他們來說不那麼重要，太久了」，這個敵人於是可忽略。此外，從歷史上看，美國從來都是要到最後才參加國際戰爭，通常不會是世界性大戰的發動者。特別是「現在美國手伸得太長，是十個指頭按住了十個跳蚤，一個也抓不住」^⑤，因而他很難騰出手來，同中國作戰。此外，毛澤東還相信：「美國會接受法國的教訓，已經（在越南）打了三年打不贏，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考慮到毛澤東在朝鮮戰爭和1958年台海危機中同美國直接較量所獲得的經驗，以及在1962年台海危機中美國轉達的不支持台灣進攻大陸和不會捲入同中國軍事衝突的信息，他對美國沒有企圖同中國發生戰爭衝突的估計是有道理的。

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即如何看待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部1964年4月25日提出的關於「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的報告^⑥。這個報告實際是前述「流行觀點」的基本依據，因此在研究中理應受到高度重視。

據《羅瑞卿傳》記載，自1962年中國軍隊在沿海地區準備抗擊蔣介石集團的登陸作戰以來，東南地區始終比較緊張。總參謀長羅瑞卿於1963年5月至7月實地勘察了從浙江到山東半島的地形，並向毛澤東寫了報告。此時，受中蘇關係惡化的影響，北部和西北部地區也多少使人感到面臨威脅。羅瑞卿於當年7月又對吉林和黑龍江的部分地區進行了勘察。1963年10月，羅瑞卿再次銜命勘察新疆阿爾泰、塔城、伊寧以及喀什地區^⑦。顯然，原來主要以防備美蔣進攻的「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正逐漸為「敵人處處可來」的思想所取代。總參謀部的報告大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報告認為：國家經濟建設在防備敵人突然襲

擊方面存在着比較嚴重的問題：一、工業過於集中。僅14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大約60%的主要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二、大城市人口多。據1962年底的統計，全國有14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25個50-100萬人口的城市；三、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一般多在大、中城市附近，在敵人轟炸大城市時容易同時遭到破壞；四、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過小。大型水庫中，有52個位於主要交通線附近，17個位於重要城市附近^⑧。報告在1964年4月25日由總參作戰部向副總長楊成武上呈。毛澤東於當年8月12日對報告作了簡要批示。這時，距報告上呈已經近四個月，為北部灣事件發生後的第七天。這種情況似乎說明，報告本身在提出時還不具有特別的緊迫性。但在8月5日之後，形勢有了明顯變化，報告的指向性和意義加強了。

即使如此，也很難以該報告作為國家進行根本性戰略轉變的關鍵性證據。這不僅因為毛澤東批示的時間是在他提出戰略轉變意見之後，而且還在於這種估計和預防的目標，對中國的安全對策以及機制來說，仍是「模糊的」和「不確定的」。敵人是誰？敵人在哪裏？他們可能從哪裏來？他們甚麼時間來？是否四面八方都可能來？沒人能準確判斷。如果對來敵的估計都無法確定，那麼這種緊張顯然也就失去了大部的緊迫性。目前，學術界通常把1969年珍寶島中蘇武裝衝突作為中國軍事戰略防禦重點完全北移的標誌，其時間界限應定在1969年6月20日至7月4日由中央軍委辦事組召開的「三北」作戰會議。因為，這個會議形成了《「三北」地區作戰會議紀要》，而《「三北」作戰紀要》曾經是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北部作戰的指導性文件^⑨。要形成這樣一種明確的軍事敵對關係，歷史至少又走過了五年。鑒於毛澤東和劉少奇上述對越南戰爭的判斷，至少還可以排除掉另一種可能，即整個國家經濟政治的戰略變動，是因為美國從越南構成的軍事威脅。由此可以作出的結論似乎是，當時雖然存在一定的外部威脅，但並沒有達到臨戰狀態，以致要放棄國家還十分需要的國民經濟恢復方針，去進行全面的戰爭準備。

「流行結論」還有一個重要缺陷，這就是它只循着關於戰爭已在迫近的單一線索進行思考，而忽略了當時國內的另一條歷史主線，即被放大的所謂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對整個國家政治安全所產生的影響。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來，國內政治和經濟的實際走向是兩相背離：經濟繼續維持調整；政治則向愈加強調階級鬥爭的「左」的方向發展。人們必須注意到，當階級和階級鬥爭被強調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時，整個國家的政治安全形勢也已經達到了極其緊張的狀態。此時，倒真正是「處處都有敵人」了。而不管外部的敵人還是內部的敵人，都有可能推翻現政權，於是必然加劇認識形勢的緊張化。但是，在60年代的中國，政治和經濟並行且背離的狀態是不可能延續長久的，政治總要「統領」經濟，因而，並行和背離都是暫時的，它不能不為某種突發事件所打破。「戰爭迫近說」是當時最強有力的外力因素，可以充當破壞平衡的砝碼，它的作用就在於強化政治的、軍事的緊張氛圍，從而把並行的另一端納入社會一元化的政治發展。

1964年8月13日，毛澤東同越南領導人黎笋分析美國是否決心越過17度線時說：看來美國、越南和中國幾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來。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認為：美國把蘇聯當作近期的主要敵人，特別是「現在美國手伸得太長，是十個指頭按住了十個跳蚤，一個也抓不住」，因而美國很難騰出手來，同中國作戰。這個估計是有道理的。

四 答案：國際與國內因素的特殊交互作用

可以說，1962年以來的中國政治，是以一種難以挽回的能量推動國家向緊張化發展。由於階級鬥爭需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說法，獲得了黨內

合法意義的認同，以至持續僅多半年後，除經濟以外的各方面寬鬆調整期即實際宣告結束了。1963年，「四清運動」開始。緊接着，毛澤東作出對文藝界的兩個批示。這兩個批示所引起的文藝界思想政治鬥爭，一般被看作是發動「文革」的鋪墊。因為兩個批示之後，除文藝界之外，哲學界、史學界、經濟學界，也都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鬥爭。有些代表性人物，如夏衍、周揚等人，已經在報紙上被公開點名批判。1964年，以「四不清」份子為鬥爭對象的「四清運動」在中共中央「一線」領導人的推動下，愈加蓬勃地展開。不久，「四清運動」更名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對象則變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概念的出現，可以被看作是向「文革」邁進的關鍵性一步。

一般說來，當戰爭迫近時，國家的應變措施應該是保持最大的政治穩定，同時開動經濟機器，盡可能接近戰爭準備的完成。然而，中國60年代中期的現象恰恰相反。沒有人能按正常的邏輯解釋，當北部灣事件使越戰不斷升級，而北方邊界的軍事壓力也在逐漸增大的情況下，中國內部的政治運轉反而發生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而且這種問題的發生，在根本上都是某種人為理念的產物，直至引發文化大革命這樣全面的政治動亂。顯然，這不是循着單一的戰備線索去推斷所能合理解答的。

據說，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毛澤東至少有三次在談黨內鬥爭的同時，提出要準備打仗。一次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另一次是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以1964年5-6月的這一次最具分析意義。

1964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魯曉夫鬥爭中，現在應該再轉到國內問題上來，聯繫國內反修防修問題^②。這是毛澤東本人的一個重要思想動向。國內反修防修是國際反修的邏輯發展。在中共中央連續發表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已經構築了一個在社會主義時期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的龐大思想體系，即所謂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單有在經濟戰線上、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有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否則，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這樣，毛澤東就為中國的前途與安全描繪了一幅十分悲觀的圖畫，儘管在這幅圖景中摻雜了大量虛幻的黨內鬥爭因素。

毛澤東加強反修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端正對戰爭的態度。人們對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想認同，很大程度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公平意識遭到破壞。而這種現象的根源，則是出現了「高薪階層」和「農村自發勢力」。在中共領導人看來，蘇聯的「特權階層，怕打仗，怕戰爭，要與美國肯尼迪求和妥協。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20年以後也要產生修正主義」^③。與此密切關聯的，是所謂和平時期會銷蝕革命者意志的問題。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說：和平時期必然要出修正主義，我們現在又碰到這種情況，黨內不純，部分組織已經被敵人佔領了，所以我們再不搞，再過十年，中國也會出修正主義^④。這就是為甚麼對待戰爭與和平的態度，成為中蘇論戰焦點之一的的原因。於是，加強戰備和加劇緊張狀態也成為防止修正主義產生的手段之一。

事實上，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的十三陵談話，大部分是講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問題。毛澤東列出了做合格接班人的若干條件，它們後來為「九評」蘇共

毛澤東認為，加強反修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端正對戰爭的態度。在中共領導人看來，蘇聯的「特權階層，怕打仗，怕戰爭，要與美國肯尼迪求和妥協。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20年以後也要產生修正主義」。於是，加強戰備和加劇緊張狀態就成為防止修正主義產生的手段之一。

中央公開信援引並在隨後中國政治進程中發生了重大影響。而接班人問題的引出，既同整個國際反修大背景緊密聯繫在一起，又與當時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出現的某些新說法有關。毛澤東認為，蘇聯修正主義上台，是隨赫魯曉夫騙取斯大林信任成為接班人而出現的，這是國際共產主義的一個嚴重教訓^⑩。同時，他還注意到，赫魯曉夫是善於搞政變的人。他上台後搞了五次政變，一次一次把與他意見不同的人打下去。這個教訓同樣值得重視^⑪。基於這樣的看法，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怎麼辦？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各省委要頂住。因此在十三陵談話的開始，毛澤東即提出：「大區書記要抓軍隊，不能只要錢不要槍。」這又從另一個角度提醒研究者，軍事戰爭準備與政治準備之間有着不可忽視的內在聯繫。

由此看來，1964年提出戰爭準備問題，並因此而更改按正常思路確定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指導原則，有比較複雜的政治背景。它至少是國際反帝反修和國內階級鬥爭所造成空前的緊張的綜合性產物，而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對國際軍事壓力所作出的反應。道理很簡單，當人們意識裏出現了更多的「敵人」時，或者說，當人們愈來愈感到危險在包圍和迫近的時候，改變原本設想的動機是自然的。當然，不能否定越戰所造成的戰爭壓力的確存在，也不能否定在60年代一般意義上的戰爭準備具有合理性。但是應該看到，所有這些外界因素，都是可以通過某些對外行為達到一定程度的化解的。例如，對美國發動越戰所造成的威脅，對中蘇邊界以及整個雙邊關係等等，都有尋求另一種應對的餘地。而放棄緩和的努力，因外部緊張而擴大內部緊張，使極為重要的國民經濟調整也喪失了繼續的根據，則顯然是不合理的。但是，通過「緊張」來作為繼續革命的動力，把反修防修的鬥爭擺在發展國民經濟的任務之前，這恰恰是毛澤東改變三五計劃指導方針的思想原因。至於這種「緊張」對國家經濟發展和國民生活水平提高所造成的後果，當時恐怕未在毛澤東的考慮之中。

在毛澤東積極倡導下迅速展開的三線建設，其目標的設定，如上文所示，是在一種並不確定的狀態下形成的；而其結果，也必然不能擺脫某種非現實主義思考的影響。實際上，毛澤東在內心深處並不認為越戰會直接威脅中國的安全，當1965年越戰升級，中國國內抗美援朝達到高潮的時候，毛澤東就曾不同凡響的指出：打仗有兩種可能，打得起來和打不起來^⑫。可見，在威脅真的來臨的時候，他卻在肯定「打不起來」的可能性。而對核戰爭，毛澤東關於核武器「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的說法^⑬，在當時確可稱得上是「先見之明」。但是，在毛澤東的內心深處，他顯然不能認同這樣一種狀態，即在世界性蓬勃發展的革命與戰爭潮流中，在「現代修正主義」肆意泛濫的時候，中國人卻在那裏「按部就班」、「自顧自」地恢復國民經濟。這樣做，難道不意味着丟棄自己神聖的革命責任？難道真的可以在「反帝反修」任務日益緊迫的時代保衛國家「長治久安」嗎？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此，為了革命，需要緊張；為了緊張，也需要革命。1964年中國國內發生政治經濟變動，正可以在這樣一種「旋律」中找到它合理的解讀。然而，以防備原子戰爭為目的的三線工業基地，終因原子戰爭沒有爆發而廢棄或被迫改變自己的功能。事實上，正如有人指出的，早在50-60年代，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徵已經顯現出來^⑭，而中國卻背着沉重的備戰包袱，在國內的政治緊張中一直走到「文化大革命」中去。

50年代末到70年代，毛澤東至少有三次在談黨內鬥爭時，而以1964年的這一次最具分析意義。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的十三陵談話，大部分是講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毛認為，蘇聯修正主義的上台，是由於赫魯曉夫騙取斯大林信任成為接班人，這是國際共運的嚴重教訓。毛澤東提出：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怎麼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各省委要頂住。

註釋

- ① 李富春：〈關於十年規劃問題給毛澤東的信〉（1962年12月31日），載《李富春選集》（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2），頁302-304。
- ②③④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194、1195；1193；1195；1199-1200。
- ④ 楊茂榮：〈60年代我國經濟建設戰略布局的一次重大調整〉，《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27。
- ⑤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09；811。
- ⑥ 薄一波：〈關於一九六四計劃的問題〉，《黨的文獻》，1998年4期，頁5-6。
- ⑦ 〈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的插話（節錄）〉，《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11。
- ⑧ 見李富春：〈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說明〉（1964年5月18日），《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12。李富春引用毛澤東的上述說法時，用了「主席最近說」的時間限詞。從上下文推斷，毛的這席話，應該是在5月10日、11日講的。
- ⑨ 見周恩來：〈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若干問題〉，《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15-19；劉少奇：〈繼續控制基本建設，着手搞西南三線〉，《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19-20。
- ⑩ 陳小魯：〈陳毅與中國外交〉，載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編：《環球同此涼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152。另參見《羅瑞卿傳》編寫組：《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472、477-78。
- ⑪ 「北頂南放」和「島重於岸」兩項戰略方針，是林彪1959年主持軍委後逐步明確的。參見劉志男：〈1969年，中國戰備與對蘇關係的研究和調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
- ⑫ 《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21。
- ⑬ 《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日。
- ⑭⑮ 引自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緣起和結果〉，《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頁42；44。
- ⑯ 見李丹慧前引文。9月10日毛澤東又對法國人解釋說，這並不是要蘇聯把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歸還中國，而只是說這是不平等條約，關於這樣的問題還多呢。
- ⑰ 見李丹慧前引文。赫魯曉夫9月15日與日本議員談話時強硬指出：「蘇聯的領土是歷史形成的」，「蘇聯的邊界是神聖的」，「誰膽敢破壞它，誰就會遭到蘇聯各族人民的最堅決的反擊」。
- ⑱ 毛澤東當年10月在會見崔庸健和巴盧庫時再次談到蘇聯違犯中俄不平等條約而侵佔中國領土問題。但他說：中國現在是「採取攻勢，說些空話」，使赫魯曉夫「緊張一下」，「其目的是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見李丹慧前引文，頁43。
- ⑲ 有學者專門以此為題寫了一本書，即安德魯·內森（Andrew J. Nathan）、羅伯特·羅斯（Robert S. Ross）著，柯雄譯：《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對安全的尋找》（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
- ⑳㉑㉒ 吳冷西：《十年論戰，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725、734；675-76、826；733；779。
- ㉓㉔㉕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516；513；476。
- ㉖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94。
- ㉗㉘ 《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頁34-35。
- ㉙ 同註㉒《羅瑞卿傳》，頁385。
- ㉚ 參見註㉓劉志男，頁44。
- ㉛ 鄧子恢1962年7月1日在中央高級黨校的報告，引自蕭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卷（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頁995。
- ㉜ 蕭冬連等前引書，頁1012。
- ㉝ 《九評》列出了關於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其中每一條都同赫魯曉夫作了對比。可見，當時的是非標準，完全是以赫魯曉夫作參照的。
- ㉞ 毛澤東：〈在打仗問題上要有兩手〉，《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
- ㉟ 何方：〈論鄧小平理論的時代背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1999年第2期，頁77。